

多边主义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必然选择

□ 吴晓丹

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多边主义是解决世界面临困难挑战的必然选择。在西方个别国家大搞单边主义，严重破坏国际秩序的背景下，在世界面临团结还是分裂、合作还是对抗、公道还是霸道抉择的关头，习近平主席关于多边主义是必然选择的重要论述高屋建瓴、振聋发聩，为国际社会指明了前行之路。

世界比以往更加需要多边主义。回望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各民族交往的不断拓展和加深，历史日益成为世界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各国逐渐意识到，只有在国际关系中破除无序的丛林状态，探索通过理性解决各国矛盾和分歧的有效方法，才能保证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由此催生了主张以多边方式解决国际问题、开展国际合作的多边主义理念。

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主权平等原则开始，这一探索持续了几百年。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沉重代价警示世人，零和博弈与强权政治只会将世界拖入深渊，唯有秉持多边主义，才能铸就持久和平。基于这一共同认知，各国共同努力构建起以联合国为核心、多边主义为基石的国际秩序，有效防范了世界重蹈战争的覆辙；构建起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有力促进了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今年是联合国这一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成立80周年。80年来，多边主义理念深入人心、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根基持续加固，以对话消弭分歧，以合作促进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80年后的今天，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更加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应对，世界比以往更加需要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遭遇严峻挑战。多边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更是时代所需和人心所向。但是少数西方国家却逆潮流而动。一是在国际上大搞霸权、霸凌、霸道，企图垄断国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导致国际战略竞争日趋激烈，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遭遇挑战；二是高举关税大

棒，执意打造“小院高墙”，随意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别国经济科技发展进行打压遏制，单边制裁、极限施压等霸凌行径严重损害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导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三是大肆鼓吹“文明优越论”，搞意识形态对抗，人为制造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严重干扰国际交流合作；四是大搞单边主义，“退群”“毁约”闹剧频频上演，冲击多边机制治理效能，或奉行“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小圈子的多边主义”“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借多边之名行阵营对抗之实，企图把世界推向分裂。

现代意义上的多边主义产生和兴盛于欧美，思想根源上与“西方中心主义”以及“文明优劣论”密切相连。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呈现“中心—外围”的治理架构，少数发达国家处于治理架构的“中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治理架构的“外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不断增强，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曾经主导多边主义的少数国家不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让渡更多权力，不可避免地露出了单边主义和伪多边主义的“原形”，对多边主义“合则用，不合则弃”。

重振多边主义的中国方案。面对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不断上升的国际形势，各方更需要坚定维护和重振多边主义。习近平主席强调，多边主义是解决世界面临困难挑战的必然选择。就是希望各方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维护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同球共济”的精神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

厉行国际法治，维护公平正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关键在于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恪守普遍公认的国际规则，信守共同商定的国际协定。重振多边主义必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张国际规则应该以国际法为基础，由大家一起制定，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和特权，不能谁胳膊粗、拳头大谁说了算；强调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遵守，不能搞例外主义和双重标准，不能以个别国家制定的所谓规则侵害他国正当权益。

主张对话合作，共促发展繁荣。全球性问题越复杂，越需要群策群力。全

人类挑战越棘手，越需要勠力同心。如果走对立对抗的歧路，无论是搞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科技战，最终将损害各国利益、牺牲人民福祉。重振多边主义需要各国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对话合作；倡导恪守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拒绝以邻为壑、自私自利的狭隘政策，抛弃垄断发展优势的片面做法，保障各国平等发展权利，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倡导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重振多边主义应当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摆脱意识形态偏见，最大程度增强合作机制、理念、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通过开放合作来解决全球性问题，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强调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不搞歧视性、排他性标准、规则、体系，不搞割裂贸易、投资、技术的高墙壁垒，推动世界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韧性的发展。

坚持与时俱进，提升治理效能。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践行多边主义的力量基础在发生重大变化，全球治理面临的新议题层出不穷，而多边机制建设滞后、赤字不断增加。重振多边主义要求立足世界格局变化，着眼应对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在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使之持续焕发活力，增强治理效能，更好解决新涌现的问题。

践行多边主义的中国行动。习近平主席指出：“践行多边主义，不能坐而论道，而要起而行之，不能只开药方，不见疗效。”中国不仅是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倡导者，更是多边机制的建设者和多边合作的推动者，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出兵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探索并践行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方案，促成沙特和伊朗和解复交，坚持劝和促谈大方向，为推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推

动达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围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凝聚更多共识，推动完善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新疆域治理规则，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不懈努力。

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回正轨注入动力。积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保护主义，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规则。利用进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开放合作平台，着力破解阻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结构性难题，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合作、共同受益。

强化多边机制建设。中国支持和推动联合国不断改革完善，推动联合国包括安理会更好履职尽责，更有效凝聚全球共识，动员全球资源，协调全球行动。中国加入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和600多项国际公约，忠实信守签署过的每一个条约，全力落实作出过的每一项承诺。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有普遍代表性的专业性国际组织发挥积极作用，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对话与合作机制，加强与东盟、非盟、东盟、拉共体、欧盟等区域组织的对话合作。推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实现历史性扩员，倡导建立中国—中亚峰会、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等平台，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融资机构。

（作者系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综合研究室主任）



2025年5月20日，中国与东盟十国经贸部长以线上方式共同宣布，全面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这是继2010年自贸区全面建成、2019年2.0版升级后，双方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迈出的又一关键步伐。当前，全球经贸格局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这一成果不仅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合作进入新阶段，更向世界传递了维护多边主义、深化开放合作的坚定决心。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始于2002年，其从无到有、从1.0到3.0的升级历程，堪称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的典范。2002年，双方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自贸区建设。至2010年，货物贸易零关税覆盖双方90%以上的税目产品，自贸区1.0版全面建成。这一时期，双边贸易额从2002年的547亿美元跃升至2010年的2928亿美元，年均增速达20%。2015年，双方签署升级议定书，形成自贸区2.0版，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至2019年全面实施时，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跃升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2021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的倡议，得到东盟国家积极响应。谈判于2022年11月正式启动，历经9轮正式谈判、120余场工作组会议，并于2025年5月全面完成法律审核与文本确认。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双方“以合作确定性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战略智慧。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的顺利完成，既是双方经济结构互补性的必然选择，也是制度型开放实践的重大突破。一方面，经济互补性夯实了合作根基。中国与东盟的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2024年，双边贸易额达6.99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5.9%，中间品贸易占比高达67%。这种互补性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尤为显著。例如，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在东盟投资建厂，既缓解了国内产能压力，又带动了当地电池材料加工、充电桩建设等产业链升级。另一方面，制度型开放破解了规则壁垒。3.0版首次在标准互认、数字规则等领域达成突破。双方承诺在制定标准时参考对方规范，推动新能源汽车、电子电器等领域的标准对接。数字经济章节纳入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等高水平条款，为跨境电商、数字支付扫清障碍。这种“规则先行”的模式，打破了传统由发达国家主导标准制定的旧格局，是规则、标准、管理等领域制度型开放的生动实践。

在全球保护主义逆流涌动、多边贸易体制承压的背景下，自贸区3.0版的完成具有三重战略意义。其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引擎。3.0版涵盖供应链互联互通、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等9个新增章节，推动合作从传统贸易向全产业链拓展。例如，在供应链互联互通领域，双方承诺协同应对中断风险，共建安全高效的区域供应链网络。这种深度整合将加速形成中国—东盟超大市场，带动区域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其二，地区创新合作的加速器。3.0版新增数字经济章节，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硬联通”与电子支付系统“软联通”，建立电子发票互认系统，便利区域内创新要素自由流动，深度赋能人工智能研发和跨境电商发展。3.0版明确双方在绿色贸易、绿色投资和绿色标准等8个优先领域深入开展合作，以绿色标准对接实现双方在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共同目标。其三，民生红利的跨境直通车。3.0版通过民生导向的贸易往来，直接提升地区民众生活品质与获得感。中国与东盟跨境电商交易额以年均超20%的速度增长，印尼燕窝、泰国榴莲通过电商

制度型开放实践的重大突破

□ 赵申洪

平台进入中国千家万户，满足多元消费需求。中国企业在东盟的投资为当地百姓提供就业岗位，东盟特色产品对华出口则带动东南亚农民增收，中国—东盟医药区域集采平台投入使用，便利东盟国家百姓看病就医。3.0版将合作红利直接惠及民生、通达人心，这种“接地气”的联通，让区域合作红利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

面向2030年，中国与东盟需以自贸区3.0版为起点，推动合作向更高质量迈进。一是规则升级，打造亚太数字贸易枢纽。双方可探索建立跨境数据流动“白名单”，在东盟智慧城市、中国数字自贸试验区之间构建数据通道，实现金融服务、跨境电商等低敏数据跨境互通。同时，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与东盟国家支付网络对接，同步引入区块链技术构建智能合约结算机制，降低交易成本。二是动能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合作标杆。双方合作应重点布局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借鉴中国企业青山控股印尼产业园区成功经验，建设跨境产业创新走廊。推动中国光伏企业与越南、柬埔寨合作开发分布式能源，打造“零碳自贸区”。三是机制升级，构建多元化争端解决体系。双方可设立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领域的自贸区联合委员会，强化专项议题协调机制，定期审议协议执行并协调政策分歧。还可以完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并探索引入调解前置程序，试点跨境在线争议解决平台等纠纷处理方式，提升合作稳定性。

从郑和下西洋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到今天的自贸区3.0版，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始终贯穿“和合共生”的东方智慧。此次谈判的完成，不仅是一份经贸协议的升级，更是一次发展理念的升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与东盟正携手书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崭新篇章，这既是亚洲的机遇，更是世界的希望。



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

□ 莫 忱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是一种校企协同的现代职业教育模式，其核心特征是将企业实践培训与职业学校理论教育有机结合。这一体系起源于中世纪行会学徒制，19世纪工业革命后逐渐规范化，1969年《职业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其现代制度框架的确立。发展至今，“双元制”已形成覆盖350多种职业的标准化培训体系，每年吸引约三分之二的德国中学毕业生选择这条教育路径。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成功，不仅源于其深厚的历史积淀，更得益于政府、企业、学校与社会多方协同的积极探索实践。这一职业教育模式在政策保障、产教融合、师资建设和数字化转型等关键环节形成了一套高效运作的体系，使其能够持续适应产业变革需求。

政府主导与政策支持。通过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政府能够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确保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相匹配，这对化解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与新兴产业需求间的结构性矛盾、增强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双元制”职业教育从传统学徒制正式转型为规范化、法制化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该法对德国联邦的企业职业培训作了统一规定，内容包括“职业训练内容、方法、期限、培训企业与培训者的关系和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实施培训的监督和考试”等，大大提高了德国职业教育的质量。

企业参与与产教融合。伴随产业革新的步伐不断加快，传统教育模式下培养的人才，与产业需求的适配度持续降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在培养目标、课程内容、教学实践等育人环节融入市场真实需求，能够有效化解学校教育与企业需求脱节的难题，化解结构性矛盾。德国依托“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搭建起企业与企业协同育人的桥梁。学生入学时便与企业签订培训合同，在学习期间，企业不仅提供实践岗

位，让学生积累实操经验，还发放生活补贴，缴纳法定保险。学生在企业生产场景中“做中学、学中做”，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紧密结合，实现教育与产业的高效对接，有力推动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养。

“双师型”教师队伍与培训体系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是指兼具扎实理论教学能力与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群体，配套培训体系则旨在持续提升其双重能力。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不但要求教师拥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而且还要具备娴熟的实践操作技能。其师资聘任有着有一套成熟的培训模式和任职资格制度。职业学校教师通常拥有大学学位和教师资格，主要在职业学校教授专业理论和通识课程。他们需要完成教师培训和国家考试，具备教育学与专业学科的双重素养。企业培训师是企业内部负责对学徒进行实践指导的技术人员，需通过资格认证，如通过培训师资格考试，具备一定职业经验与培训能力。职业教师参加工作后还必须进行继续教育。根据德国联邦各州的法律规定，职业教师参加进修培训是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

信息化与数字化转型赋能。数字科技迅猛发展，积极推动信息化与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提升职业教育质量与效率的重要路径。应对数字化挑战，德国加大职业教育4.0建设。要求职业学校须为学生提供数字化的学习环境，教师应通过技能培训具备应用数字技术的技能和开展数字化教学的能力。职业学校要将数字化融入课程建设和教学实施，开发在线学习课程、数字化学习内容和数字化教材等，以促使学生的学习更加有效。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针对企业，启动了“跨企业职业教育培训中心与能力中心数字化”项目，支持培训中心更新基础设施，开发数字化教学方案和课程内容，利用人工智能、3D打印、

互动平板和移动设备等技术，模拟数字化工作场景，开展现代化技能培训。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植根于德国特有的经济社会土壤，其成功实践不仅为德国制造业的持续竞争力提供了人才保障，也为全球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强化政策引领，筑牢制度根基。德国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建立了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制体系。在职业教育领域，政策引领与制度保障发挥着基础性和全局性的关键作用。清晰的政策导向能够为职业教育的发展锚定方向，促使资源的合理配置，让职业教育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与师资保障。科学的制度框架不仅能够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消除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还能吸引更多优质生源投身其中。

深化产教融合，畅通供需循环。德国“双元制”的核心理念就是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产业、企业和行业深度参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能有效搭建起学校与产业之间的桥梁。通过在育人各个环节融入市场需求，一方面，让学生所学知识和技能能紧密贴合行业实际，毕业后能够迅速融入工作岗位，减少人才培养与使用的中间成本；另一方面，企业也能及时获得适配的人才，推动自身创新发展，促进产业升级。这在解决教育与产业脱节的结构性矛盾同时，进一步推动了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形成多方共赢的良性循环。

建强“双师型”教师队伍，赋能教学适配。德国对职业教师的资格认定、专业发展等方面有严格的要求。“双师型”教师队伍及其配套培训体系，突破了理论和实践教学各自为战的局面。教师凭借行业经验，把理论知识转化为生动的实操案例，帮助学生扎实掌握知识与技能，显著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同时教师能够将行业的新动态、新技术

融入课堂，推动课程内容更新与专业设置优化。这给我们带来多方面启示。一方面，师资来源不能局限于传统渠道，要积极引入企业技术骨干，充实师资队伍，为教学注入新活力。另一方面，要搭建教师发展平台，开展理论、实践技能和教学方法的培训，让教师在教学与实践中找到平衡。此外，应深化校企合作，建立教师定期实践机制，使教师能及时了解行业动态，把最新的技术和规范融入教学。

推进数字转型，提升职教效能。德国的职业教育4.0计划强调数字技术能力的重要性，并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推动职业教育改革与创新，以适应新技术革命的需求。数字技术不仅打破了教学资源的物理边界，实现全球优质教学资源的流通与精准适配，还能以人工智能驱动教学和实训场景，让学生在模拟复杂产业场景的过程中，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满足数字经济对创新人才的要求。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院校应将数字化思维融入办学理念。一方面，应推动教育与技术深度融合，打造高质量数字化学习环境。要将数字化作为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抓手，不仅从硬件层面加快基础设施升级，更注重教学内容、课程体系与教学方式的全面转型。另一方面，应健全校企协同机制，构建共建共享数字化培训生态，要鼓励企业深度参与数字化人才培养全过程。打造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职业教育数字化体系，有助于实现产教融合的深层次联动，增强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